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当代解读：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陆寓丰　尚庆飞

【摘　　要】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的隐性继承。这一极具生命张力的哲学方法，是辩证法、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它不是毛泽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的，而是在实践中“做”到的，因为中国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出发，不断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正是借助实践的维度，毛泽东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关 键 词】马克思；毛泽东；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作者简介】陆寓丰(1989-)，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2016.5.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15JJD7100004)。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隐性继承。借助对革命与现实的强烈关怀，以实践为中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独特的活力。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非简单而抽象的口号，而是极具生命张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绝不仅仅体现在辩证法中：就历史观而言，它能够使我们既看到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同时代共同点的抽象共性，也看到具体历史阶段的现实个性；就认识论而言，它能够让我们既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的抽象普遍性，又认识到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殊性。虽然这一辩证关系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切入视角和理论支撑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在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契合。可以说，只有借助中国革命实践的中介，才能看到毛泽东对马克思方法论意义的继承，才能理解缘何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不仅仅是辩证法，而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才能理解毛泽东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1 对话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历史感的科学认识论

体现在《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1]317。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崭新哲学世界观的发现，那么《资本论》的出版就标志着马克思崭新科学方法论的最终形成。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上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升到具体颠覆了认识事物的方法范式，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体现的强大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是一种纵向的毫无矛盾运动的线性历史观，而是站在机器大工业以来构建的现代性的维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次推进，都是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更深层次的展开，从而揭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灭亡的逻辑必然。因而，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展现的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现实过程，也是对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历史感的科学认识论。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人们思维逻辑形式的呈现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论述这样两种认识方法：第一种认识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将“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2]41。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丰富的表象抽象为简单的规定，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归纳出事物共同属性的抽象。但如果停留在这一点，就会堕入形式逻辑的怪圈，将抽象当做绝对天然的永恒存在而忽略了抽象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弊病所在，他们眼中的商品只是抽象的经验层次意义上的商品，而停留在纯粹经验层次来抽象地讨论商品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将商品关系永恒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不变的固化物。而马克思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静态的线性抽象，因为没有历史感的抽象是无法找到上升为具体的道路的。于是，马克思论述的第二种认识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正确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看来，经验认识过程与思维过程是不同的，前者的起点必须是直观具体，而对于后者而言，思维具体是多样性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思维综合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42。也就是说，不是将生动的具体简化为抽象的规定，而是将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比如在看到劳动工具这个抽象规定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中呈现的永远不是抽象的劳动工具概念，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的体现一定生产方式的劳动工具实物。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认识过程是起始于对事物最简单的抽象规定，经由思维综合，逐渐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过程。

从唯物史观角度而言，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论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历史感，唯物史观的历史感恰恰在于其过程的生成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商品章置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标题下去研究，这实质上是把商品关系当作对资本关系合理抽象的基本关系来研究的，这恰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精彩之处：只有从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出发来研究商品，才能抽象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起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运动，才能将逻辑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合理性批判上来，才能由这一最基础的简单矛盾运动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性，才能看到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性。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抽象，是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代共同点的抽象。当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环节和过程。“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基础——客观物质生产，科学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3]3。显然，只有将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过程中才能抽象出历史共同点，才能得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基础。虽然看上去这种一般是抽象的，然而当它在历史中再现的时候，所呈现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内容更为丰富的具体。

因此，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方法，而是基于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具有历史感的科学方法论。正是借助这一方法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权力构建的深层经济根源，为开启无产阶级的革命合法性以及实现现实变革的必然性的大门找到了钥匙。而在遥远的东方，同样是为了找寻现实的革命出路，为了从理论根源上结束一切意识形态的缺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纽带，与马克思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2 对话毛泽东：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

正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一样，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也不仅仅承载了毛泽东哲学的辩证法功能，譬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320。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内在哲学韵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隐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唯物史观原则和认识论方法，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

其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历史感在于矛盾的过程性。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事物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路径，而是充满矛盾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仅停留在事物发展的线性时间意义，就会被事物的经验现象所遮蔽，无法深入事物的普遍本质。因此，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感成为理解事物发展的根本，而毛泽东对这一原则的继承和发扬主要体现在他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论述中：一方面，由于矛盾具有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始终的普遍性，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存在着矛盾运动，而这种矛盾运动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4]305。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发展绝不是线性的纵向线索，而是包含着内在矛盾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另一方面，由于矛盾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而这种矛盾特殊性不仅存在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4]309中，也存在于“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4]310。即毛泽东认为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及矛盾的每一个方面都各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不是僵化的，而是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运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来说明。首先，虽然中国革命进程中有诸多矛盾，但这些矛盾各不相同：既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也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其次，这些矛盾的性质、地位的特殊性的变化始终根源于革命的发展过程。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挑衅和侵略，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被激化，而其他矛盾的地位却下降了。而最明显体现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历史感原则，就在于毛泽东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相互转化时，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矛盾的例子。毛泽东认为，“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4]318且反之亦然，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于是对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4]318，即对于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特殊的了。因此，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停留在经验的表象，而是将事物的每一个具体形式都视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环节，他才能看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与转化。并且，毛泽东强调这种转化是相互的，也就是不仅矛盾特殊性可以转化为普遍性，矛盾普遍性也可以转化为特殊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以及将中国具体革命的实践经验升华为毛泽东思想提供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了理论渊源。从这一意义上,毛泽东通过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对话。

其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是辩证法,也是认识论。《矛盾论》当然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矛盾论》,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来叙述辩证法的。譬如毛泽东在《矛盾论》正文部分的开始就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视为"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4]300。也就是说,辩证法作为宇宙发展的法则既体现在客观世界中,也体现在人类的主观认识领域里,辩证法与认识论是统一的,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论述中。首先,既然矛盾具有普遍性,那么人们的思维领域也无法避免矛盾,矛盾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客观现象中,也普遍地存在于认识世界中,并且"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4]306。其次,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还特别强调了矛盾特殊性的认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法看到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也无法发现具体事物运动发展的原因。而这种从"研究"出发来论述矛盾特殊性的表述方式,在《矛盾论》中随处可见。于是,虽然各种物质运动过程中的矛盾都具有特殊性,但在毛泽东那里,矛盾特殊性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意义而出场的。最后,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转化的关系时,毛泽东直接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出发,认为认识的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类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深化,不懂得这一点,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毛泽东不是单纯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进行一般论述,而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论述的深刻之处所在:正是赋予了辩证法以认识论的叙述角度,实践的意义就通过认识论的中介自然地显现出来了。正如诺曼·莱文所说,"当所有人把辩证法当作哲学来理解时,毛泽东却把它当作政治—革命战略来理解。"[5]256在毛泽东那里,辩证法除却其本身的哲学内涵,还肩负着革命的行动指南的实践意义。因此,从认识论角度去叙述辩证法,是毛泽东继承认识论原则对辩证法的必然创新。

3 方法论的对话:在实践中的继承

如果单纯从理论谱系学角度来直接比较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那么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显性差异:毛泽东更加关注的是中国革命现实的矛盾,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主要是指向一种思维逻辑再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的论述更具有辩证法的韵味,而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唯物史观意义上的认识论分析。的确就形式而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似乎是两种无法对话的方法论。但是,单纯的字面解读和对照并不能作为判断这两种方法是否有内在一致性的根本依据,因为"简单地采取'形式对照'法就无法科学裁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存在。"[6]而对方法论的真正判定依据在于其现实的实践效用上,对于这一点,中国的革命实践已经给出了答卷。正是以实践为中介,毛泽东提出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与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成了某种精神契合:毛泽东在实践中继承的不是马克思的方法本身,而是其方法论意义。

那么,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将已经揭示出的历史发展本质重新回溯于具体现实的历史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具体,也是历史的具体。虽然《资本论》是马克思以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为例,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的著作,但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来的景象”[7]8。即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虽然在当时只能在发达的英国得以验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定能够重现于具体的现实。因而，虽然就认识论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式上再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维逻辑。但更重要的是，正是马克思将事物的具体特征当做事物变化过程的一个片段，才能看到其现存状态的历史性，进而能够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事物发展的轨迹。所以就方法论的现实意义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是思维的逻辑，也是将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再现于具体的现实世界的历史逻辑。而将这种历史的一般本质与具体的现实相连的历史逻辑再现于中国，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因为当毛泽东在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时，其实质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本质回溯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逻辑。于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仅仅是一般的国情和特色，而是暗合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中的。

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之所以能够继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逻辑，是因为根植于这一方法论中的中国革命实践本质。也正是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教条主义者用无数次失败的教训证明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仅是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实践中危害中国革命的做法。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不是将教条的理论直接应用于具体的现实，而是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有机结合，从而抽象出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的实践理论，而只有这种内化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才能够真正成为推动革命胜利的强大助力。因此，实践原则是毛泽东能够继承马克思方法论意义的内在根源。于是，相较于矛盾普遍性而言，矛盾特殊性成为毛泽东更看重和发挥的部分，因为由矛盾特殊性所引申出来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成为推动现实革命前进的重大现实动力，比如毛泽东制定的抗战时期革命策略政策就是对矛盾特殊性原理运用的典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是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又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特殊性，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找到彼此的转化中介。在毛泽东那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除了其本身的哲学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意义。将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战略领域，与其说是与马克思的不同，毋宁说，它丰富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维度。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内化为一种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方法论，用以指导20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这恰恰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4 结语

总而言之，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的隐性继承。借助对革命与现实的强烈关怀，以实践为中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独特的活力。就其政治意义而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这一极具生命张力的毛泽东哲学内涵，将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跨越时空的方法论对话。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所说：“当毛泽东把一整套的社会分析方法建立在矛盾观念上时，他的社会分析方法有着不同于机械决定论模式的基础。”[8]485这种拒斥机械决定论的方法，不是毛泽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的，而是在实践中“做”到的。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维度出发去比较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才能发现掩盖在两者形式差异下的相似本质，才能发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理论根源和方法论意义当然是彻底的马克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思主义，才能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视为毛泽东哲学的辩证法，也视为辩证的历史认识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出发，不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正是借助实践的维度，毛泽东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6]尚庆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与检验标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8)：12-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张翼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An Upd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 From Marx to Mao Zedong

Lu Yufeng　Shang Qingfei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 raised in *On Contradiction* by Mao Zedong carri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up to the concrete. This vivid methodology is a combination of dialectics, theory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was not come up from the Marxist doctrine, but from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was a process of combining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It is the practice that helps Mao Zedong to develo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abstract up to the concrete 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Marx; Mao Zedong;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 from the abstract up to the concrete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